

《延安文学》精品书系第一辑

陕北早期党史资料

赵通儒 著
魏建国 整理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陕北早期党史资料 / 赵通儒著; 魏建国整理. —
北京: 中共党史出版社, 2018.11
ISBN 978-7-5098-4840-1

I. ①陕… II. ①赵… ②魏… III. ①中国共产党—
党史—史料—陕北地区 IV. ①D235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11397 号

出版发行: 中共党史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韩冬梅

复 审: 潘鹏

终 审: 汪晓军

责任校对: 龚秀华

责任印制: 谷智宇

责任监制: 贺冬英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

邮 编: 100080

网 址: www.dscbs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70mm × 240mm 1/16

字 数: 313 千字

印 张: 23.5

印 数: 1—2050 册

版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98-4840-1

定 价: 52.00 元

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

电话: 010-82517197

目 录

赵通儒传略 / 1

概 述 / 7

总 论 / 37

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最早活动 / 37

国民党在陕北的25年 / 43

陕北党组织七次重要会议情况 / 48

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陕北各县代表大会 / 48

接受八七反右 成立陕北特委

流产的中共陕北各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/ 54

米脂中秋事件

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特别紧急扩大会议 / 65

为二次代表大会流产、解决米脂事件特委

被反革命捕人后之善后及继续工作问题

中国共产党第二次陕北各县代表大会 / 71

1929年初 绥德张家渠会议接受六大决议 争论造反问题

中国共产党陕北特委特别紧急会议 / 79

1929年正月 清涧高杰村会议执行陕北二代会及二届特委决议

贯彻六大决议建立南路特派员 充实清涧县委工作

文柏山(耙子山)五县书记联席会 / 89

1929年春 清涧 传达六大决议

中国共产党陕北特委特别紧急会议 / 93

1930年初 安定枣树坪会议解决与北方局重新恢复与建立关系问题

陕北各县早期党的活动情况 / 97

中国共产党在府谷 / 97

神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 / 106

定边早期的共产党和共青团 / 119

延川早期的共产党和共青团 / 127

共产主义思想传播于安塞 / 134

中国共产党在宜川的活动 / 141

吴堡共青团共产党的最初十年 / 146

延长最初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/ 153

共产主义运动在米脂最早的十年 / 164

中国共产党横山县诞生的前后 / 180

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在延安 / 191

佳县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 / 200

早期的中共清涧县委 / 215

封建统治下生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榆林县委 / 245

马克思主义的播种在绥德 / 275

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安定——子长 / 316

后 记 / 371

赵通儒传略

赵通儒，字仰普，化名宋之元、匡中等，绰号聋子、博士、图书馆。陕西安定（今子长）县人。1910年生。1924年在绥德四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为陕北入团最早的十人之一。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26—1927年年底，任中共绥德地委常委、青年委员兼团地委书记等职。1927年春，在他建议并操作下，中共绥德地委将陕北23县教育局长全部换成党团员，使我党完全掌握了陕北的教育阵地。同时，他反对地委领导人公开党员的错误主张，坚持隐秘，准备逆境，使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陕北未受到彻底摧残，保存了党员干部和群众。这两个因素，成为陕北党得以从失败中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。大革命失败后，陕北党组织与北方局、陕西省委失去联系，赵通儒成为被井岳秀通缉的第一位共产党人。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在未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，主动工作，只身抱病，赤手空拳，奔走各地，重建了党的组织，为党在陕北的生存，做出了续绝存亡的贡献。他首先恢复了绥德党团县委及下属五个区委，参加清涧起义未果后，遍走绥德、横山、米脂、榆林、神木、府谷、佳县、吴堡等地，又给三边、延安、安定、清涧等处写信，恢复了近20个县的党团县委、区委组织。

1928年年初，赵通儒在绥德与省委派回的杜衡接上组织关系，商定成立陕北特委，并全面承担了筹备工作。春，中共陕北各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西川南丰寨古庙召开，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和青年团陕北特

委，赵通儒任特委农运委员兼绥德县委书记。夏，他领导绥德人民开展了城区农民抬龙王斗县长、四十里铺抗杂税、义合抗烟亩等斗争。秋，在米脂中秋节事件中，他最早发现敌情，主张转移，遭杜衡反对，杜衡、焦维炽、贾拓夫被捕。危急关头，他沉着应对，组织人员转移文件，安置代表，处理善后，召集未被捕人员在苗家坪召开会议，恢复了特委工作，保全各县未受破坏。1929年年初，赵通儒筹备、参加了中共陕北各县第二次代表大会（张家渠会议），会后任特委职委、南路特派员，领导清涧以南13县的工作；兼任清涧中心县委书记，全面负责清涧、安定、延川、延长、延安五县工作。不久，他与谢子长、白明善等召开清涧高杰村会议。之后，他主持召开清涧五县（区）委书记联席会议（耙子山会议），推动了各县工作，策动了后九天起义。1930年农历正月上旬，赵通儒与谢子长、白明善等召开安定枣树坪会议，他被任命为陕北特委派赴河北代表，赴北平寻找北方局，恢复关系。他不负重托，圆满完成了任务，农历四月就恢复了北方局与陕北的直接关系，还在北方局帮助下恢复了陕西省委，并建起了陕北与西安、北平的关系。后又恢复了上海党中央与陕北的关系，建起了江西中央苏区与西北的联系。

赵通儒在北平学习、工作了五年之久（1930年春—1935年春），公开身份为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学院（后改为法商学院）学生，先后在中共顺直省委、河北省委、华北赤色互济会党团等部门工作。他一边刻苦学习，一边秘密工作，一边公开活动，把许多来北平的陕北青年学生，打入全国各地，还为陕北输送了很多干部。1930年冬，他将白明善、谢子长调到平津，参加了清算盲动路线的会议。九·一八事变后，他首先提出抗日主张，策动青年学生发起“卧轨”“请愿抗日”运动，一直蔓延到华北、华南。1932年年初，北方局迭遭破坏，李馥华、李力果等党员同志向河北省委、北方局建议，由赵通儒出面负责北方局工作，并推举李馥华当面征求意见。赵通儒婉拒了同志们的好意。1933年春，赵通儒奔赴冀东，在国民党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参加了长城抗战，并在该部中树立了威信。他和

乔国桢把上海受训的谢子长、阎红彦要回北方，一起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。赵通儒提出了“抓基本群众”和“向冀东22县发展，扩充武装”的正确意见，未被接受，返回北平。察变失败后，他接应、安置了谢子长、白坚等同志，分析全国形势，促成谢子长下定返回西北的决心。

1935年春，赵通儒任北方局派赴陕北特派员，回到陕北苏区，传达了中央《关于将土地革命与抗日运动联系起来的决议》，以及要陕北给北方局送人送钱，接济北方局渡过困难的指示。之后留在苏区，领导开辟了经济战线的工作，任陕北省苏维埃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，主持成立了财政部、贸易局和银行，发行了钞票，推动根据地经济战线各项工作迈入正轨。延长解放后，他顶住了破坏石油厂的错误命令，释放外籍技术人员，保护了石油厂，粉碎了敌人散布的共产党“只搞破坏不搞建设”的谣言。

1935年夏秋，赵通儒顺应人民意愿，三次请缨解放瓦窑堡，终获同意。西北工委成立瓦窑堡革命委员会和瓦窑堡围城总指挥部，任命赵通儒为主席兼总指挥。他组建了西北军委警卫团，灵活运用人民战争方法，围困解放了瓦窑堡这座陕北军事重镇和中心城市，壮大了西北红军，筹款十万余元，取得了与劳山战役齐名的空前大捷。

瓦窑堡解放后，赵通儒任陕甘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陕北省苏维埃秘书长兼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、瓦窑堡市副市长等职。党中央进驻瓦窑堡时，他担任迎接党中央的招待委员会主任和欢迎委员会主任，妥善安置了各中央机关，解决了衣食住行等问题，保证了党中央的休养生息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成立时，赵通儒任办事处秘书处处长。

赵通儒还是陕北同国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开拓者。瓦窑堡围城前，受命以西北党政军全权代表身份，与驻瓦窑堡的国民党军八十四师五〇〇团团长李少棠谈判，成为西北革命史上的创举。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后，被任命为中央白区工作部北路工作处处长。外交部成立后，又被任命为北线主任（南线主任为李克农），负责对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的统战工作。1935年年底，赵通儒三次与八十四师代表秘密谈

判，达成了文字协议。中央政治局对这一成果高度重视，毛泽东亲笔致信高桂滋。后来，八十四师虽没有“通电起义参加红军”，但实现了停止内战，稳定了根据地的北方战线，为红军东征和西征解除了后顾之忧。

红军西征时，赵通儒被调到陕甘宁省委，后被高岗调去从事蒙古族工作，成为我党少数民族工作的开拓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。1936年任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。1937年任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蒙民部副部长。1938年11月，陕甘宁边区党委成立中共伊盟工委，赵通儒任书记，对外称八路军留守兵团驻伊盟联络参谋处上校参谋主任。1939年底调回延安。1940年任延安蒙古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，蒙古文化纪念馆馆长，东亚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主席团主席。1941年8月，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。1945年2月，西北局重建伊盟工委后，赵通儒再任书记，兼边区民委城川办事处主任、民族学院主任。1946年10月因起义部队反水被捕，押送榆林。狱中囚禁三年，坚贞不屈，备受折磨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。1949年2月获释。

赵通儒出狱后，经组织严格审查，恢复了党籍。西北局拟派他到城工部工作，任西北局统战委员会秘书长兼统委委员，东北局拟派他到绥远省委、内蒙古党委工作，均因病未能就任。1949年9月初，赵通儒到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报到，被安排到全国政协工作，后被中组部取消了任命。参加开国大典后，赵通儒先去东北住院治疗，1950年2月返回西安，被安排到中央第二党校休养，1952年年底转西安常宁宫西北高干疗养院休养。1953年7月28日，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秘书长。

赵通儒在榆林狱中备受摧残，大脑被注入毒剂，患上了严重的“幻听”“幻视”病，终生未愈，逐渐发展成为严重的“偏执型精神分裂症”。病情驱使下，他屡有异于常人、悖于常理的言行。他对中央重用起义人员的政策颇有微词，因此被视为“对组织不满”，受到严肃处理。1954年6月，西北行政委员会机关党委作出“关于批准赵通儒退党的意

见”，7月上报西北局，经中央批准，宣布开除党籍，8月送回高干休养院休养。休养期间，他写下大量珍贵的党史资料，将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奋斗历史，生动完整地记录下来。

1957年后，赵通儒因重组家庭择偶非人，造成恶劣影响，加上到处写信，再次受到处理。1958年12月，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，将赵通儒的待遇由行政9级降为15级，并着其回家，每月由县供给。1959年1月2日，赵通儒在子长县接到处理决定后，决定去北京申诉。途经内蒙伊克昭盟时，遭人控告，被带回西安。6月13日，被送到周至国营农场余管营站劳动教养，1961年9月16日解除劳教。1962年1月28日，民政厅介绍赵通儒回子长县养老，列入编外人员，按行政17级待遇，每月发给生活费101.5元。赵通儒先后向乌兰夫、习仲勋副总理写信反映情况，请求帮助。在习仲勋关怀下，民政厅将待遇调整为14级，每月发给生活费141.5元。子长县在实际执行中按每月150元对待，粮食供应由33斤增加为45斤。

1964年9月，赵通儒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，如实反映了当年接待、安置党中央进驻瓦窑堡的情况。记者写了内参后，将他卷入了政治争论中。25日，省委书记处作出批示。28日，省人事局发出取消赵通儒生活待遇的通知，决定从1964年10月起，取消给他每月150元的生活费和公费医疗待遇，口粮按当地群众标准供应。同日，延安地委决定，禁止赵通儒编写“党史”“烈士传”，讲“革命斗争史”，并由子长县公安局严格控制他的行动。

“文革”爆发后，赵通儒进一步受到迫害。1966年8月29日，子长县造反派第一次召开批斗会，赵通儒第一个被戴上纸帽，绑到街头批斗。1967年6月16日，赵通儒接待了一名北京外调人员，来人建议他去北京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解决问题。1968年9月28日，赵通儒偷跑到北京，闯进某外宾医院，被送到派出所审查。10月24日，子长县派人将他从北京带回，县军管组作出“以法拘留呈捕”的决定，关入监狱。1969年9月20日，经延安地区革委会政法组批复，又给戴上右派帽子，送劳动教

养。11月28日,军管组鉴于他在监患病,不便劳教,报经地区,同意保外就医。12月19日,赵通儒去世,终年60岁。

1980年9月16日,中共子长县委对赵通儒问题进行了复查,做出了撤销“以法拘留呈捕”和“右派、劳教”的决定。

魏建国 撰

2017年6月22日 改定

延安 去奇斋

概 述

一、出版缘起

提起陕北，真不知从何说起！

在漫长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，陕北地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地带，远离中原农业文明中心，几乎没有登上过中国历史大舞台。即使有几次上去了，聚光灯也从来没有打到身上。陕北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主角，享受到聚光灯打在身上的荣光，毫无疑问，当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的13年。这是陕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，是陕北人内心少有的充满自豪的一小段“幸福时光”。当时，延安作为全国两大政治中心之一，比另一个政治中心——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或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，更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。那时，延安享誉全球，日、苏、美、英、法、德……世界列强无不关注，国人更不用说。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完整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，凝聚成一个极具战斗力和生命力的强大政党，掌握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、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根本方法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，拥有了夺取全国政权，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能力。还是毛泽东说得好——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上，他满怀深情而又严肃地向全党指出：“没有陕北我们就不得下地。我说陕北是两点：一个落脚点，一个出发点。”

对陕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性，全党的认识完全一致。问题在于：土地革命时期，我党在南方先后建立起十几个强大的根据地，而在北方只有陕北根据地（包括陕甘边）这一块，面积不大，人口不多，兵力不强。结果却是南方的根据地全都丢了，唯有陕北根据地保存了下来，其中必有其内在的原因。纵观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，不难发现存在着明显的畸轻畸重的现象：对延安13年的研究，全面、系统、翔实，相关著作车载斗量，汗牛充栋，研究范围也十分广泛：政治路线、组织建设、理论体系、统一战线、政权建设、群众观念、军事思想、战略战术、经济发展、文化事业、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，都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；而对于党中央到来以前的陕北历史的研究，则极其有限，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。从1924年秋冬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陕北建立，到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抵达，陕北的共产党人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浴血奋斗了12个年头，陕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做出了巨大牺牲，付出了无数人的心血、汗水和生命，才组建起了雄厚的党员队伍，创造了巩固的根据地，建立起人枪逾万的红色武力，组织起上百万的人民群众，使陕北成为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根据地。同样是党的领导，同样是信仰马克思主义，同样受到党内“左”和右的错误路线干扰，同样受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酷“围剿”，为什么全国的根据地都丢了，而陕北却能够保存下来？这确实需要我們进行认真的思考。

事实上，对于陕北根据地得以幸存的原因，近年来已有不少论述及总结；而对于陕北党组织的建立、发展和巩固，特别是对陕北党组织的特点及其经验，却少有人阐发。虽然有一些相关著作问世，但并没有做出合情合理、令人信服的解释，缺乏全面系统反映中央到达之前12年间陕北党的奋斗历程的著作。国内出版了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或传记，成为宝贵的史料，但这远远不够。原因在于：一些当事人在参加革命初期，或因年龄小，不懂事，记不清；或身处党的基层组织，只了解自己身边的一些情况，只知道自己单线联系的上下级的情况，对党在陕北的

全面情况根本不可能了解。稍微高级一些的早期党员，要么文化低，写不了；要么工作忙，没有时间写，大多没有留下足够的有价值的文字资料。即使有的留下一些资料，由于理论素养与认识水平的限制，或者语焉不详，或者错讹屡见。从学术层面看，学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，虽有些成果，但不成体系，意识形态的概念化说教多，让人心服口服的鲜活材料少。因此，后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早期奋斗史，始终不能全面了解，总有雾里看花的感觉，印象模糊，七断八截，不成体系。

以陕北建党时间为例，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没有争议，一致认为是1924年秋冬。西北党史上很多重要人物，如谢子长、刘志丹、白明善、阎红彦、马明方、焦维炽、乔国桢、史唯然、雷恩均、邓重庆、罗伯福、杜嗣尧、杜衡、杨璞、李明轩、冯景异、杨国栋等，至少有四五十人，包括本书作者赵通儒在内，党籍都是1925年。笔者手里有一份1941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赵通儒党籍问题的原始手稿，由陈云部长亲笔签名，明确认定了赵通儒1925年的党籍。这是经过党的各级组织包括中央在内长期调查与严格考察后认可的，经过延安整风和“文革”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反复考察而没有任何问题。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，陕北建党时间出现了不同说法，牵涉面极大，以至形成了悬而未决的一大公案，甚至出现了某级党委发红头文件硬性规定陕北建党的时间，结果出现了“陕北有大批1925年的党员，而党组织却在1926年才出现”之类无法解释的问题，可见陕北党史的复杂与分歧到了何等程度。

党史界亟须要对陕北早期党史能起到正本清源作用的权威著作。赵通儒的《陕北早期党史资料》，正是这样一部能够弥补这一缺失的难得之作。

二、学术价值

这部珍贵的史料，堪称陕北党史“秘籍”。它首先是真实的，其次是

全面的,也是比较权威的。

这部著作的真实性,首先表现在所记述的事件基本上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。其次,写作时间离史实发生时间很近。这部著作记述的主要是1924年秋陕北建党到1935年秋党中央到达陕北这一时期的史实,而最早的腹稿形成于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后的1936年。因此,这部著作比20世纪80年代后众多陕北老干部的回忆录更接近事实。那些回忆录,大多由当事人口述,经工作人员整理而成。年代久远,当事人的回忆本身也会有误差。

这部著作的全面性,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:第一,在同时期的陕北党内同志中,赵通儒是唯一一名始终坚持陕北斗争的干部。别的同志都有离开陕北的经历,所以对陕北党团组织的情况自然没有他清楚。第二,从1924年秋陕北建党以后,赵通儒始终在党组织的核心层担任主要领导工作。当时他在陕北党内所处的重要地位,也决定了他实际上是陕北特委真正的直接的负责人。赵通儒是陕北最早加入党团组织的十人之一,并且是十人中唯一一名始终留在党内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党员。其他党员,有的牺牲,有的叛变,有的脱离。所以,他对陕北党组织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,没有中断,自成系统。并且,他始终身处陕北党内最高层,从大革命时期的中共绥德支部、绥德特支、绥德地委,再到土地革命初期的中共绥德县委、陕北特委、清涧中心县委兼特委南路特派员、陕北特委驻北平特派员,一直到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的西北工委、西北军委、陕甘晋省委、陕西省苏维埃内,始终如此。他又是陕北革命根据地首府瓦窑堡的解放者。当时,解放瓦窑堡是与劳山战役具有同等意义的空前大胜利,陕甘晋省委将二者相提并论,发出了捷报。他还是迎接、安置党中央进驻瓦窑堡的实际负责人……身居高层的经历,使他对陕北党的全部历史都了如指掌。

因此,本书的权威性毋庸置疑。除此之外,构成本书权威性的因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:

首先,从作者自身品德与修为等主观因素而言,他根本不屑于伪造

历史，抬高自己。赵通儒是一个极其纯粹的人，对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一片至诚至爱的赤子情怀，没有一点私心杂念。他从少年时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后，终身坚信不疑，为了党的生存、发展、壮大，贡献了全部的智慧、心血和汗水。因为无私，他才能秉笔直书，才能留下真实的历史。如果他有私心，以他的资历、能力、地位、水平，早就可以在党内取得更高的位置。他是成立中共陕北特委的实际组织者，却力推杜衡担任特委书记；杜衡离开时，又推杨国栋代理，自己始终甘居幕后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中共北方局在平津一带屡遭破坏、摧残，党内一些同志从实际斗争中认识到了赵通儒的品德、能力与水平，由李馥华、李力果等向上级建议，要赵通儒出面来组建北方局，担负领导工作。这个意见得到了至少20多名党员同志的支持，派李馥华当面征求赵通儒的意见。赵通儒如果有私心的话，完全可以顺水推舟，接受同志们的拥戴，出面组织北方局。假如履历中有这样一笔，对他以后在党内的地位，肯定十分有利。但是，他婉言谢绝了同志们的推戴，始终踏踏实实地在党的基层工作，随时准备做关键时刻的一张王牌，在别人无法完成任务时才去完成最重大最危险的任务。当土地革命蓬勃兴起，党在陕北公开活动，一些领导人掌握了一定权力后，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私心杂念，借故打击、压制他，致使不知内情的党中央始终不能充分了解与信任他，从而对他正确使用。他一生放言无忌，虽有个人不断受到压制之后宣泄的因素，更是自身对党一片至诚至信的爱党护党之情使然。因为赤诚，因为纯粹，因为无私，所以他不屑为自己的名誉、地位、权势而争。赵通儒和李子洲、谢子长、刘志丹、白明善、焦维炽等诸多革命先烈一样，都是放弃了个人的荣华富贵，为绝大多数下层民众寻找出路，是真正的英雄豪杰与仁人志士。

其次，作者本人的学术水平与理论素养，成为本书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有力保障。作者平生嗜书如命，勤学一生，精通中、俄、英、日、蒙五种语言，经史子集、天文地理无不涉猎，又有丰富的斗争经历、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。他早在幼年时就通读《论语》，是安定县闻名遐迩的“神

童”，十四五岁就写出全面批判孔子儒学经典的文章。他一边刻苦读书，一边投身实践，学以致用，融会贯通，因此，既有精湛的文化理论水平，又有高超的实际工作能力。1930年远赴北平，在国立北平大学苦读五年，更使他的学问突飞猛进，成为陕北党内公认的第一位红秀才、有名的知识分子。他的这部著作，既生动翔实，又全面完整，从社会学的角度，将陕北各地民情写得入木三分，活灵活现，全景式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前陕北的社会状况，清楚地说明了陕北人民为什么会接受马克思主义，为什么要开展武装斗争？所以，从学术角度而言，即使不谈党史，仅从社会学、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，本书也有很大的价值。

三、内容概述

本书共25篇，包括：国共双方各1篇综述，作者筹备与主导的陕北特委7次重要会议各1篇，陕北23县中延安以北16县各1篇。这16个县，都是共产主义运动开展较早、党的活动比较活跃的县份。作者是这16个县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和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，情况十分熟悉，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，游刃有余，其中以榆林、米脂、佳县、横山等县着墨较多，而作者最为熟悉的安定、绥德、清涧三县则写得最为详尽。只有延安以南的甘泉、鄜县（今富县）、洛川、中部（今黄陵）、宜君（1983年由延安行署划归铜川市）五县和保安（今志丹）、靖边没有写。这七个县，要么是党的力量薄弱、活动不多（如延安南五县），要么是作者自己参与不多、情况不太熟悉（如保安、靖边）。本书的内容，大致可分为陕北社会状况、党在陕北的诞生与发展、陕北特委早期主要活动和党史重要人物等四个方面。整部著作，立论准确，行文流畅，条理清晰，详略得当，全面反映了作者的理论修养、思想水平、学术功底和表达能力。

第一，从社会学的角度，以平民的视野，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清末民初陕北的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多方面的真实情况。本书内容极其

丰富，涵盖了陕北的建置、沿革、资源、物产、山川、河流、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人文、阶级、阶层、宗教、信仰、战争、兵役、商业、金融、科学、文化、人口、方言、风俗、民情、服饰、饮食、居住、交通、婚嫁、丧葬、瘟疫、饥荒等诸多方面，堪称一部文字版的清末民初陕北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写16个县的文章，内容都是两大部分，首先是各县的社会状况，其次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。书中的许多内容现已失传。这种记叙，颠覆了自古以来史学著作的抽象说教，而是从平民的角度观察历史，寓史于人、于事、于社会，在平静的叙述中，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史料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。本书给读者最大的感受，是其强烈的现场感，能够让人穿越漫长百年岁月的时空隧道，置身于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，在身临其境中了解历史。自古以来，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，一直是阅读史学著作最难能体会到的，也是衡量史学著作能否传世的重要标准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同类题材著作，大都充斥着意识形态概念化的说教，读者被灌输了很多抽象的概念，却很难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。在此，我们信手拈来一些史料加以说明：

作者在《清涧》一文中介绍清涧县情时，顺便介绍了整个陕北的建置沿革情况。在《榆林》一文中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陕北在明清时期的兵制。书中还生动地记录了陕北很多著名的物产，如宜川的香水梨、清涧的红枣、安定的砖窑等，最生动的莫过于写绥德的高粱醋和清酱了。书中还记录了绥德的银矿与安定的煤炭、焦炭、油母页岩等矿产资源。对延长石油及其开发写得最为生动、完整，可参看《延长》一文。

从社会各阶层不同的饮食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贫富之间的差别，《宜川》《榆林》《横山》等文对此都有生动的记录。如《宜川》一文中所描述的：“（宜川）农民饭食，麦面较多。安定，富农才能每月初一、十五吃一顿麦面。延安、延长、延川，中农可以十天、五天或三天可吃一餐面或馍。绥、米，要小地主、地主才能每三五日一次面或馍。延安、延长、延川，富农可以每五天或三天吃一餐面或馍。府谷、神木、榆林、横山近沙漠地